

A decorative border at the top of the cover features various butterflies in different colors (blue, orange, black, red) and flowers (red, orange, purple) on a light background.

十九世纪中国外销 通草水彩画研究

CHINESE EXPORT
WATERCOLOURS ON PITH
IN 19TH CENTURY

程存洁 著



十九世纪

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

程存洁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 / 程存洁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5325-5263-4

I. 十… II. 程… III. 水彩画—绘画史—研究—中国—19
世纪 IV. J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31783号

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第八次资助社会科学出版项目

装帧设计: 玲子 赵岑兰
责任编辑: 徐衍

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
程存洁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网址: www.guji.com.cn

E-mail: guji1@guji.com.cn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20 印张 20 插页 2 字数 100,000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册

ISBN 978-7-5325-5263-4/K·1143

定价: 19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序——通草画的前世今生

毛 民



初识存洁兄，是在2002年秋北京大学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遥遥望见一位白衣飘飘、清瘦沉静的青年，挽着银须白发、丰神俊朗的英国老绅士，潇洒而行。这就是广州博物馆的程存洁博士和收藏研究通草画的伊凡·威廉斯先生。老少两人在会上言语不多，却显亲昵和默契。他们的论文，令会上许多学者和我一样，惊奇而愧怍地第一次听说了世上“通草画”的存在！会后大家议论纷纷，脑海里纷飞着古埃及的纸莎草纸，死海的羊皮古卷，西域高僧携来的印度佛经贝叶，越南进贡西晋朝廷的蜜香纸，唐朝西传阿拉伯的撒马尔罕纸，苏东坡和黄庭坚酷爱的高丽笺⁽¹⁾……却茫然不知百年前广州产的通草纸为何物！

2000年伊凡老先生向广州博物馆捐赠70余幅通草画，存洁兄前往英国约克郡接收。受了伊凡的深刻感染和熏陶，博士期间专攻唐代东都与边城研究的存洁兄，从此无可救药地迷上了通草画这门艺术。通草画创作，盛行于19世纪的广州，专门外销欧美。这些中国题材、西洋趣味的画作，如同晚清广州版的《清明上河图》，留给西方人活色生香的中国印象，至今还存活在欧美怀旧人士的记忆中。通草画兴盛了一百年，之后又消亡了一百年。百年的历史不长，曾经风靡西方各国的通草画，却已杳然不为国人所知；尤

其是原产地广州，博物馆里近五十年几乎没有通草画的收藏。更为痛惜的是，如今制作通草片的手工作坊也濒临绝灭，1987年美国学者伊莲还在台湾新竹县找到最后一家作坊；1998年蔡斐文到访台湾时，那作坊已人去楼空。怀着“为往圣继绝学”的苦心，本书作者开始了七年的追索。

当初最为焦愁的就是，如今世上还有通草片工艺传人吗？2002年5月作者终于在贵州贵定县寻觅到了幸存的通草片匠人王玉龙。庆幸的是，他在研究中遇到了伊凡、伊莲、孔佩特、甘文乐等西方学者，他们自从童年时见过祖父辈收藏的通草画，滋生了不舍的中国情结，多年来风尘仆仆地走访中国的荒野村落，了解不为人知的手工艺秘密。如果没有这一群鬓发苍苍的欧美长者还在寂寞地收集和研究通草画，这一宝贵文化遗产可能就此湮灭在历史尘灰中了！许多珍贵的通草画稿作为研究资料，从海外各地的热心友人那里，如同翩翩的雪色蝴蝶，飞往广州镇海楼的书斋。

存洁兄笔下，这些甦醒了的雪色蝴蝶，诉说着通草画的前世今生：长在寂寂岭南山中的通脱木，如何被匠人们砍下茎髓，切割成通草片；肥润莹白的通草画纸，躺在窗户高敞，南风熏熏的林呱新呱画室里，被赋予了各种鲜活的生命；十三行的水晶吊灯下，西洋公使、传教士和仕女们聚在一起赏玩新画，引来一片惊叹之声；通草画作为礼物纷纷从黄埔乘船出海，被捧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宫廷，成为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周游东方时的手边最爱；经历了百年荣耀，传世品又从收藏者后代手中，进入英国剑桥牛津、美国麻省的博物馆，默默展示着晚清的风俗人文画卷；一些流落民间的通草画与伊凡夫妇在剑桥集市上惊喜重逢，为此夫人放弃了买她的皮大衣；一批通草画珍品，近年来被瑞典英美的友人们收集捐赠，辗转回到了故乡广州博物馆。

一个在中国本土消亡了百年的通草画世界复活了！随着本书铺展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段见证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图像历史，一场欧美学人饱含温情、牵扯家族往事的追忆；

一幅天朝华洋杂处、婚丧吊庆的民生百态图卷。乾嘉盛世之后的广州，成为天朝通商海外的唯一口岸，丝绸、茶叶、瓷器、漆器、牙雕，堆得货栈满山满谷。通草画上的羊城，如同汉唐丝路上的敦煌玉门关、《东京梦华录》里的北宋汴梁、马可·波罗笔下的元代杭州天城、黑白影片里的旧上海一样；那西洋人眼中的异国情调，令国人恍如隔世的旧日风光，虽然已经消逝，仍然勾起后世的怀念和憧憬。

日本流传过一首脍炙人口的俳句：“在盛唐的时候，漫步于夜晚的长安市。”此刻让我们跟着画卷，游历一回华丽而苍凉的晚清时代，在市声嘈嘈的广州街头流连。穿梭于引车卖浆者流之中，听得叫卖声甜甜。英国作家毛姆《在中国的屏风上》感叹：“上千种嘈杂的市声喧腾而上，你不能说出汹涌在你周围的千万个生命到底是什么。”你听见那状元及第的报喜队伍，敲着锣鼓走过；元宵节的童子们扛着花篮灯笼，一路吹吹打打；在狭窄的街口，你撞见新式消防水车呼啸而来；江边藤竹编的养鸭船里一刹那间放飞出上千只鸭子，羽毛如同大雪，悠悠飘过江面。如同俞平伯先生笔下的杭州市井《清河坊》“清河坊的闹热，无事忙耳。他们越忙，我越觉得他们是真闲散。……哪怕它十分喧闹，悠悠然的闲适总归消除不了。”

想不到质地松脆易裂，极难保存的通草画，百年后依旧色彩瑰丽，宛如新生：小娘子的脸颊上泛着新鲜的水蜜桃色；翡翠绿耳环在皇后鬓边闪光；清朝皇帝闲坐在孔雀绿的帷幔下，手里拿着玉如意；官员袍子边上翻滚着宝蓝色的海浪；文官夫人披着粉色的云肩，百褶裙上绣着梅枝；芒果玉米的叶缘还留着虫噬焦黄之迹。带着匠气的写实笔触与喜剧意味的情节，仿佛扮演着一出出东方情调的大戏。

忽必烈汗问马可·波罗：“你是为了找回你的过去 或者未来，而来东方旅行的吗？”马可·波罗回答：“他乡，是本地风光一块镜子的反面。旅行者从中能看见他亲身拥有的生活，是何等的单调；而他所错过的异国风情 又是如何的纷繁有趣。”这是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一书中的对白。⁽²⁾忽必烈汗这位伟大的君王，感伤自己居然从未有闲暇游历当年蒙古人血汗征战来的众多华美城池，于是沉迷于眼前这位威尼斯青年的描绘，以满足其好奇心。

我们生得太晚，不能亲历两百年前的广州，却可以在这本书里寻回旧梦。张爱玲《更衣记》里写道：“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吧。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来的甬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绣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走过通草画卷连成的甬道，暮色低垂，我有些迷失，又有些沉醉，惘然间十三行华灯初上，从巨大的拱形露台吹来夏夜的凉风；船头涂着大眼睛的乌艚白艚，正旗幡猎猎，驶进黄埔锚地。

2008年4月 谨识于伦敦大学东方学院

注释：

(1) 古埃及的纸莎草属于莎草科(Cyperus papyrus)，印度贝叶属于棕榈科的扇椰树(Borassus flabellifera)，越南蜜香纸来自于瑞香科的沉香木(Aquilaria agallocha)，撒马尔罕纸的原料是亚麻(Linum usitatissimum)，高丽笺是厚重莹白的桑皮或楮皮纸(Broussonetia papyrifera)。

(2) [意]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看不见的城市》(Le Città Invisibili)，意大利都灵出版，1972年。

目录

序——通草画的前世今生 / 1

第一章 导论 / 1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 4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思路 / 6

第二章 “通草”一词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演变 / 9

第一节 米纸与莲纸和莲草纸 / 10

第二节 “Rice-paper”一词的各种中文译名 / 14

第三章 我国历史上通草的使用情况 / 18

第一节 我国古代人民对通草的认识 / 18

第二节 明清时期通草的地域分布 / 27

第四章 通草片的制作和功用及通草水彩画的绘制和保护 / 33

第一节 通草片的制作和功用 / 33

第二节 通草水彩画的绘制和画风 / 41

第三节 通草水彩画的保护问题 / 46



第五章 通草水彩画的原产地与画家 / 49

第一节 通草水彩画的原产地 / 49

第二节 通草水彩画画家 / 53

第三节 通草水彩画画家与西方画家的交往 / 56

第六章 通草水彩画的题材及内容 / 60

第一节 港口风景风情 / 63

第二节 广州新式消防 / 65

第三节 船舶 / 67

第四节 街头买卖 / 74

第五节 各行各业 / 76

第六节 茶叶和丝绸的生产和销售 / 79

第七节 人物肖像画 / 82

第八节 社会百态 / 83

第九节 戏剧表演 / 85

第十节 习俗与节庆 / 87

第十一节 刑罚 / 91

第十二节 花鸟虫鱼 / 93

第七章 后论 / 102

图版 / 109

主要参考文献 / 309

后记 / 311



第一章 导 论

广州口岸作为传统南海道的起点，不仅是中外商品交换的贸易港，而且历来是中国外销商品的生产基地和出口地。从16世纪以来，随着明清时期中西直接贸易在广州口岸季节性的开展，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制度之后，广州口岸成为了西方人唯一可以进入的中国沿海港口，许多极具西洋色彩的新事物、新行业、新型外销商品在广州出现，经济交流与文化传播紧密相联，使广州成为了中西接触了解的重要窗口。

当时，中国及其所象征的东方色彩，对西方人散发着无穷的吸引力。有机会到中国旅游和经商的西方人，不但把许多中国产品带回祖国，更直接或间接地把他们对这古老国度的认识和印象介绍给其国人。许多西方国家出现了不少记载中国风物的书籍、报纸和杂志报道。作为清朝皇帝身边的天文学数学“日讲官”多年的耶稣会传教士们，亲身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的盛世。1702-1776年，他们用法文分卷书写的《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向欧洲人展开了天朝的画卷：君主开明；官员由开科举士选出，不论出身贵贱，量才施用；庶民正直忠孝，社会文明开化。古老的中国文明如同一片文化上的“新”大陆被传教士们发现，引发了欧洲启蒙思想学家的极大震动。帕斯卡在《沉思录》中有个著名的自问：“哪一个更为可信？是先知摩西，还是中国？”费内隆在《死者的对话》中，设想了孔夫子和苏格拉底的对话；勒瓦耶在《论异教徒的道德》中，提出美德并非基督徒独有，孔夫子就是东方异教徒美德的明证。伏尔泰在1756年的《风俗论》一书中，将人类的历史从中国开篇，将中国推崇为“全世界最智慧，最文明的国家”；孔夫子的儒教是理想的“文人的宗教”。^{〔1〕}

因此，在17—18世纪的欧洲，出现了盛极一时的“中国风”（chinoiserie）。起先盛行巴洛克，继

而盛行洛可可这样的矫饰之风，而中国出口的陶瓷、刺绣等外销物品偏重华丽、繁褥、精巧，恰好迎合了欧洲贵族的口味。崇尚奢侈的欧洲上流社会被淹没在中国舶来潮水之中：南京的云锦、粤绣的舞裙、青花瓷、景泰蓝、茶叶、漆家具、帷幔、挂毯、壁纸，营造出马可·波罗带回的东方迷梦。18世纪末开始英国青花瓷盘上大量烧制“柳树”纹样，让孩子们每天在餐桌上见到中国：风吹杨柳，庭院深深，小桥流水，仕女在亭边林下怡然自得。餐盘上的中国风景，两百年来对几代英国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²⁾英帝国之王乔治四世（1811—1830年在位）在年轻岁月做王子的时候，在英国海边的布莱顿小城盖起了一座中国趣味的宫殿，轰动一时。其中的中国器物后来被张伯伦勋爵搬到了白金汉宫。至今内阁大臣们有这样一个习惯，在金色红色的白金汉宫大厅开会时，如果感到会议沉闷，就不免会抬眼望一望盘绕的龙和中国灯笼，一边幻想自己到了无比遥远的中国。⁽³⁾186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掠夺来的一大批珍品被献给了拿破仑三世，欧也妮皇后决定将这些珍宝陈列于枫丹白露宫，找来建筑师帕卡尔为此特别布置了一个大厅，在第三共和国期间被称为“中国馆”向公众开放。法国收藏家吉美于1889年在巴黎开办了“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展示东方藏品。这些珍宝无疑给法国艺术家们带来丰富灵感。在19世纪下半叶，举办万国博览会成了巴黎的特权，差不多每隔十年举办一次。其中最吸引欧洲人的是法国建筑师的“中国风”作品：1867年受圆明园风格影响的茶亭，1900年模仿紫禁城的黑龙殿（Palais du Dragon Noir）。⁽⁴⁾

1792年有法文诗歌颂巴黎建成“中国浴场”：

多么奇妙的地方！
不必走出巴黎，
就在皇宫剧院中，竟有中国女优，
一支来自北京的乐队，
响亮而夸张地，演奏马丁的独奏，
但在中国浴场，却是另一番妙趣：
从雅致的凉亭中勾勒出，
石膏岩堆下，

那构造优美的人工洞穴，
如此巴黎的人们，
在自家门口，
拿着手杖，就能到达广东。

“广东”（Canton）俨然成了一个时髦华丽的代名词。正是在这种“中国风”的历史背景影响下，在摄影术尚未流行的年代里，题材繁多的贸易绘画，吸引了无数的西方顾客，大量外销。这批贸易画的内容或风格既与西方艺术大异其趣，又有别于中国本土人文画，成为一种融合中西风味的画作。伴随中外贸易的开展，来华的西洋画家游历之余，带来了西方写实绘画风格和透视法、明暗法，向中国本土画师匠人揭示了一种崭新的表达方式。适值外销市场又对此类融合了中西风味的画作大为渴求，于是画室作坊一时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从事各类外销贸易品的创作。其中，兴起于19世纪初的通草水彩画，就是这类贸易画中的一种，是在这类画室里绘制的。

为了满足西方顾客的需要，广州外销画家在紧靠广州十三“夷馆”的同文街和靖远街（即西方人称之为“新中国街”和“老中国街”）建起了画室，这样外国商人在广州期间可以去这些画室挑选或订购作品。《番鬼画——汇丰银行藏品中的乔治·钱纳利和其他艺术家的画作》一书介绍：

首座画室开放于18世纪最后十年，至19世纪30年代已经有了良好积极的贸易；至19世纪中叶，中国画家不再完全依赖住在广州的商人，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大批量地向西方销售画作来争取那些非旅游者的钱。正因如此，与其他商品如瓷器、茶叶等一样，这样的绘画作品逐渐以中国“外销画”或“贸易画”一名而闻名于世。无论买者是追逐奇货的西洋商人，还是欧美的收藏者，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愿望，即了解中国，这个他们陌生的，但又神奇巨大且与他们本国很不相同的国家。他们想以形象化的形式将中国的情况呈现在自己面前，将这些收藏品集中在一起以便对中国形成一个全面的认识，展示每一个细节。^{〔5〕}

这批通草水彩画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销售到英国及欧美各地的。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我们对广州外销通草水彩画的关注和研究，源于2000年11月英国友人伊凡·威廉斯先生的一次捐赠。他将自己珍藏的70余幅广州外销通草水彩画捐赠给广州市，并由广州博物馆收藏。由此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并引发我们开始深入研究和积极收藏这类画作。通过七年多的努力，目前我馆共有361幅通草水彩画。

对广州外销通草水彩画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1822年，《爱丁堡科学期刊》（*Edinburgh Journal of Science*）刊载了有关通脱木树种较详细的描述。可以说，这是欧洲较早详细描述制作通草片的树种的有关记载。从现有资料来看，最早对通草及通草片的制作进行较系统研究的学者是罗伯特·珀杜（Robert E. Perdue, JR.）和查尔斯·克雷贝尔（Charles J. Kraebel），他们于1961年在《经济植物学》（*Journal of Economic Botany*）第15卷第2号发表了合著《制造米纸的植物——通脱木》（*The Rice Paper Plant — Tetrapanax Papyrifera*）一文，文章介绍作者在台湾考察时看到当地人制作通草片的过程，还附有一些有关通脱木及通草片制作过程的照片。但文章误将通脱木生产的茎髓片称为“米纸”。

在谈及通草水彩画研究史时，我们不可不提及的是著名学者卡尔·克罗斯曼（Carl L. Crossman），他对中国外销水彩画，包括通草水彩画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6〕}

此外，尤其值得一提并令人称赞的学者是家住英国约克郡的伊凡·威廉斯先生，他不仅是最早对通草水彩画进行认真系统研究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引发世人关注通草水彩画的文物捐赠者。他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在关注和研究从我国广州外销欧美各地的通草水彩画，其足迹已遍及欧、美、澳大利亚、亚洲等地。在伊凡·威廉斯先生的启发下，广州博物馆和中山大学历史系于2001年9月共同举办了《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情调——伊凡·威廉斯捐赠十九世纪广州外销通草纸水彩画》展览，并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与展览同名称的论著。这是第一本系统研究18、19世纪广州外销通草

水彩画的书。⁽⁷⁾书中,我们虽然不再将这类质地的水彩画误称为“米纸水彩画”,但是我们称之为“通草纸水彩画”依然不准确、不科学。

2002年5月和11月,我两次前往贵州贵定县考察并看到了当地手工艺人生产“通草片”的全过程,由此我首次将此类质地的水彩画正名为“通草片水彩画”或“通片水彩画”、“通草水彩画”。⁽⁸⁾

此后,伊凡先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通草水彩画作了深入探讨和研究。⁽⁹⁾他就通草水彩画产生的国际历史背景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贸易公司的海员、商人和职员想带一些纪念品回欧洲向朋友和家人展示一下自己的所见所闻。适用于水彩的精美的中国纸张,或者是从欧洲进口的纸张,都因为太昂贵而无法符合廉价的彩色图画巨大的需求量。19世纪初,广州画家开始使用一种更便宜的材料,它是从一种名叫通脱木的小植物的茎髓中切割而成”。他还注意到东西方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在影响着西方人对中国艺术的追求。⁽¹⁰⁾伊凡先生在《慧眼识珠——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No Got Eye, No Can See—Chinese Export Watercolours on Pith*)一文中呼吁:“在爱沙尼亚、法国、西班牙和中国广州的展览唤醒了公众和学界的兴趣,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我们期待着中国学者更广泛地参与这些画作的评估,从艺术学乃至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的角度研究这些作品。”⁽¹¹⁾

2007年2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江滢河博士著《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一书。他在该书第三章“清代的广州外销画”中揭示了有关通草水彩画一些弥足珍贵的西方文献资料。

长期以来,不仅是通草水彩画生产地的人们对这种绘画已完全隔膜,即便是购买地的人们对这种材料的绘画也认识不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其原因,伊凡先生也作了分析和探讨,指出“今天的人们很少意识到它的存在,从何处去寻找也不易”;“人们没有把它确认为是艺术作品,结果在欧洲的艺术画廊里没有展示这类绘画作品,导致西方艺术史家和评论家很少涉及它,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¹²⁾即便是著名的西方艺术史家和评论家,他们也仅仅认为这些绘画“不过是匠人之作罢了”,“西洋画实在不能称其为艺术”。⁽¹³⁾因此,虽然这种绘画曾在19世纪风靡一时,但是很快被世人遗忘。今天,随着对通草水彩画的深入研究和藏品的逐步增多,我们对通草及通草水彩画所涉及的历史背景和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思路

近几年来,虽然国际学术界和文博界、收藏界已逐渐在关注和研究从广州外销的这一批通草水彩画,但是,总体而言,人们对通草水彩画及其价值还缺乏科学的认识,要么夸大其市场收藏价值,要么对其评价过低;通草水彩画原产地的人们甚至对此十分陌生;许多学者亦不明白这是何质地的水彩画。因此,本书需要解决和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一些。

首先要明析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中英文名词称谓的演变情况,如对本书所要探讨的生产通草水彩画质地的早期名称“米纸”、“莲纸”等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辨析。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发掘中西方历史文献资料,了解通草水彩画从我国外销到西方世界的演变过程。

其次,从历史学的角度探讨通草水彩画于19世纪兴起于广州的原因。其原因一方面取决于广州历史上的特殊地位。自秦汉以来,广州一直是祖国南方贸易大港,尤其是广州成为清朝政府特许的“一口通商”时期,东西方文明交流和商品交易均率先在此地进行。这就使得广州成为一座得风气之先的城市,许多极具西洋色彩的贸易画聚集在广州发展起来。另一方面通过深入发掘中文历史资料,我们看到,在我国历史上,我国人民很早就对通草的性质和功能有深刻的认识。当外国人喜欢这种质地的水彩画时,广州人能融会贯通、创作和生产出具有东西合璧风格的通草水彩画。

再次,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探讨清代中叶到民国初年广州外销通草水彩画的兴衰历史与艺术风格,以及对西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生产通草水彩画的画家是当年身处社会底层的画匠,他们为了谋生,要么受雇于某些画室,要么自己开设画室。这些画家当中,有些既是艺术家,又是商人。他们在与外国商人的长期交往中,不仅学会了外国语言,而且了解和掌握了西方人的风俗习惯和审美情趣。他们面对西洋画风所产生的反映与中国文人士大夫完全不同,他们积极地吸取异国绘画风格,将本国社会风土人情以东西合璧式的画风描绘在通草片上,向外国人销售,以展示东方社会风情。

由于对这种水彩画的质地,无论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无论是学术界、文博界、收藏界的学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十分陌生。因此,涉及通草质地的保护问题则显得尤为突出和紧迫。本书还将自己在实践过程中所得出的一些保护方法和心得作些阐述。

尽管这批外销通草水彩画的“原创性”不强，但是题材十分广泛，它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和反映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宫廷院体画和中国传统的文人画，成了十分难得的反映广州口岸社会风情的珍贵图像资料，极大地补充了中国传统的官修史书和文人笔记的文献记载之不足。这些外销通草水彩画的画面内容更多地关注社会民生百态，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因此，我们可以十分自豪地说，外销通草水彩画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和社会史中的地位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目前国际学术界对外销通草水彩画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有关中西方的文献资料还需要进一步发掘，尤其是中文方面的资料。因此，本文通过发掘和整理这方面的资料，以便对外销通草水彩画的发展历史进行整体论述，这不仅会丰富中国绘画发展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而且会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19世纪中国社会风情。

注释：

(1) [法] 缪里尔·德特里著，余磊、朱志平译《法国—中国：两个世界的碰撞》，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页31—33。

(2) Hugh Honour, *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 London, 1961.

(3) [英] 马克·钟斯《欧洲的中国风》，载《广州艺术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一辑，页2—9。

(4) [法] 缪里尔·德特里著，余磊、朱志平译《法国—中国：两个世界的碰撞》，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页46—47。

(5) G.H.R.Tillotson, *Fan Kwae Pictures—Paintings and Drawings by George Chinnery and Other Artist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Spink & Son Ltd., London, 1987.

(6) Carl L.Crossman, *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China Trade* (《中国外销装饰艺术》), Suffolk,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1997.

(7) 陈玉环主编，程美宝、程存洁编纂《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情调——伊凡·威廉斯捐赠十九世纪广州外销通草纸水彩画》，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9月。

(8) 见拙文《19世纪广州外销通草水彩画画纸研究》，载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

(9) Ifan Williams, No Got Eye, No Can See—Chinese Export Watercolours on Pith (《慧眼识珠——中国外销通草纸水彩画》), 载《艺术史研究》第四辑,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2年12月, 页433—444。Ifan Williams, “Painters on

Pith”, *Arts of Asia*, Vol.33, No.4, July-August, 2003, pp.56—66. [英] 伊凡·威廉斯撰, 程存洁译《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来自欧洲的观察》(Ifan Williams, *Chinese Export Watercolours on Pith—A European Perspective*), 载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 新史料与新问题》,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年1月, 页411—428. Ifan Williams, “Painted on Pith”, *Country Life*, March 4, 2004, pp.82—83. Ifan Williams, “Twelve Young Women—Further Studies in a Search for the Earliest Chinese Paintings on Pith”, *Arts of Asia*, Vol.35, No.1, January-February, 2005, pp.128—133. Ifan Williams, “Nicholas of Russia Travels to the East III: A Gift en Route,” *Manuscripta Orientalia—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Oriental Manuscript Research*, Vol.11, No.3, September, 2005, pp.28—49. Ifan Williams, “Beauty in Pursuit of Pleasure,” *Apollo—the International Magazine of Art and Antiques*, November, 2006, pp.58—65. Ifan Williams, “Tea, Pith, and monkey business,” *The Magazine Antiques*, Vol. CLXXIII, No.1, January, 2008, pp.184—193.

(10) [英] 伊凡·威廉斯撰, 程存洁译《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来自欧洲的观察》(Ifan Williams, *Chinese Export Watercolours on Pith—A European Perspective*), 载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 新史料与新问题》,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年1月, 页420—421。

(11) Ifan Williams, *No Got Eye, No Can See—Chinese Export Watercolours on Pith* (《慧眼识珠——中国外销通草纸水彩画》), 载《艺术史研究》第四辑,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2年12月, 页444。

(12) Ifan Williams, *No Got Eye, No Can See—Chinese Export Watercolours on Pith* (《慧眼识珠——中国外销通草纸水彩画》), 载《艺术史研究》第四辑,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2年12月, 页433—434。

(13) [英] 苏利文著, 徐坚译《艺术中国》,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6年12月, 页215。